

克里斯蒂娃学术思想的发展流变

殷祯岑, 祝克懿

(复旦大学中文系, 上海 200433)

摘要: 国际著名学者朱莉娅·克里斯蒂娃 (Julia Kristeva) 的学术思想经历了互文性理论阶段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 - 70 年代初)、解析符号学阶段 (20 世纪 70 年代) 和精神分析阶段 (20 世纪 80 年代 - 至今)。这三个阶段的研究看似互不相关, 实为一条连贯的线索: 解析符号学是对互文性理论的深化和升华, 为互文性理论提供了动力支持, 而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社会政治研究则是以解析符号学思想为据点向整个人文学科的拓展。本文试图梳理克氏思想的发展轨迹, 从共时层面和历时层面的双重视角出发复原学术语境中的克里斯蒂娃, 为多学科视域中的克氏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克里斯蒂娃; 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思潮; 互文性理论; 解析符号学; 精神分析; 女性主义思想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85 (2015) 04-0054-12

1965 年圣诞节前夕, 克里斯蒂娃只身来到巴黎, 开启了她的法国学术之旅。到达巴黎后, 克里斯蒂娃马上发现法国学术思想与自己熟悉的东欧学术传统迥异。当时的法国思想界正在经历由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转向的新思潮, 巴特、阿尔都塞、拉康等一大批思想家齐聚巴黎, 盛况空前。克里斯蒂娃很快融入到这一学术气氛之中,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思考。

从 1965 年至今, 克里斯蒂娃的思想演变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从 1965 年克里斯蒂娃到巴黎至 20 世纪 70 年代初。这一阶段克里斯蒂娃将东欧学术背景与法国新思潮融合起来, 出版了《符号学: 符义分析探索集》(1969)、《作为文本的小说》(1970) 等重要著作, 提出了以互文性理论为特色的符号学思想。第二阶段: 20 世纪 70 年代初到 80 年代初, 克里斯蒂娃全面引入精神分析, 提出并完善了解析符号学理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诗歌语言革命》(1974)、《多元逻辑》(1977) 等。第三阶段: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 克里斯蒂娃完成了“从语言学到精神分析的转变”。她以精神分析和解析符号学理论为据点, 将研究范围扩展到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女性主义思想等更为广大的领域。代表作有《爱情传奇》(1983)、《黑色的太阳》(1987)、《外国人——我们内在的东西》(1988) 等。

克里斯蒂娃一方面积极地融入西方文化传统和学术思潮, 一方面又始终以异乡人的身份自居, 通过陌生的眼光观照她所研究的语言、心理、社会、文化。正是这种既依偎又独立的学术姿态, 成就了克里斯蒂娃学术的世界影响力。

第一阶段: 20 世纪 60 年代 - 70 年代初

克里斯蒂娃到法国后即随哥尔德曼做关于新小说的研究。但她不久发现, 比起小说的形式结

收稿日期: 2014-11-05

作者简介: 殷祯岑, 女, 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修辞学、语篇语言学。

祝克懿, 女,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修辞学、语体风格学、语篇语言学。

构, 小说体裁的起源问题更能引起她的兴趣。于是, 克里斯蒂娃将研究的重点转向小说体裁的形成上, 完成了处女作《作为文本的小说》, 从此开始了她以成义过程而非结构本身为对象的符号学研究。

《符号学: 符义分析探索集》(1969)、《语言, 这个未知的世界》(1969)、《作为文本的小说》(1970) 是克里斯蒂娃这一阶段的主要成果。在这些著作中, 她提出了以意义生产性和互文性为特色的符号学理论, 超越了结构主义只关注静态、封闭的符号系统的研究方法。克里斯蒂娃之所以能提出这种“超越前辈”的观点, 得益于她将东欧-苏联学术背景与西欧学术传统及法国新思潮的结合。这一阶段, 索绪尔的符号学研究、当代法国符号学研究和东欧学术思想对克里斯蒂娃的影响尤为突出。

(一) 索绪尔与互文性理论

西方学者对符号的关注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 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符号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由索绪尔和皮尔斯分别创立的。

索绪尔以语言学为基础创立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是20世纪符号学研究的主流。他将符号分为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 能指是符号的物质层面, 所指是由能指引起的心理概念。能指和所指不能分割, 其结合是任意的。符号本身没有意义, 只是通过与其他符号的连结和差异而获得意义。结构主义符号学从纷繁的语言现象中提取静态抽象的结构系统, 通过描摹这个系统中有差异的成分及其相互关系来达到对人类语言的宏观认识, 而不考虑符号系统的具体使用及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开启了20世纪学术研究的新范式, 迅速席卷整个社会科学界。然而, 常常被人们忽视的是, 晚年的索绪尔在对史诗“易位书写”的研究中, 表现出对自己建构的符号学体系的挑战。

“易位书写(anagram)指由变换一个语词或短语的字母(音响)顺序而构成另一语词或短语的方法……例如, 圣母玛利亚的名字 Marie 和法语动词 aimer (爱) 就是易位书写的关系。”^①索绪尔在拉丁文和吠陀梵文的史诗中发现“易位书写”的大量存在: 在拉丁文碑铭的农神诗歌中, 诗行中某些元音与辅音出现的数量和位置具有严密的对称性, 这种对称的语音分布使主题词(一般是被称颂的神的名字)能在诗歌诵读的韵律、节奏中不经意地反复出现, 从而起到意义的强化作用。于是, 语言超越了符号线性表意的层面, 开启了韵律指意的新层级。

索绪尔的“易位书写”研究表明: 在具体的指意实践中, 能指、所指的简单对应关系可以被打破, 线性语言规则之外还可以建构起新的表意层级。如此, 符号不再是封闭、静止的语言体系, 其中可以充满动态、多元的不确定因素。

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思考建立在对索绪尔的批评性解读之上: 结构主义符号学忽视了时间因素和主体因素, 过于强调符号结构的确定性和封闭性, 研究的是静态、同质、形而上的语言结构, 而实际的符号使用往往是动态的, 是在主体的参与下发生的, 具有流动性和不稳定性特征; 在“易位书写”研究的启发下, 克里斯蒂娃撰写了《建立复量符号学》(1967), 提出以“不确定性编码”为核心的诗性语言理论。克里斯蒂娃以诗歌语言为突破口, 展开了以开放、动态、多元为特征的, 加入了时间因素和主体因素的符号学思考, 实现了对结构主义的超越。

(二) 当代法国符号学研究 with 互文性理论

当克里斯蒂娃决定以诗歌语言为突破口更新符号学的理论方法时, 正在进行的法国符号学

① 马津 《索绪尔的易位书写理论及其影响》,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年第 5 期。

思潮为她带来了全新视野。传统符号学研究大多关注符号的形式结构,而当代法国符号学家们却认为,仅以结构形式为对象的符号学不能揭示符号指称意义的本质特征。他们纷纷建构新的理论体系,试图从根本上把握符号与其所指对象的关系和符号指称意义的方式问题。

1. 格雷马斯的符号学理论

格雷马斯以叙事语篇为对象,希望通过文本的表象,寻找制约符号指意的本质性语义结构。格雷马斯认为,意义具有表层和深层双重结构,深层结构指人们在与经验世界接触的过程中,在认知中建构的关于客观世界的结构化理解。它是“独立于能指的实质的、不变的和共同的基本结构”^①。它牢固地存在于意识的底层,对人类的符号实践具有制导作用。表层结构即人类在符号实践中运用形式指涉意义的结构。表层结构中的符号形式与其意义并非简单对应,对符号的理解必须诉诸深层结构才能进行。这样,“同样的一个词,往往是包含两类不同的基本意义的组合:其中一个是不变的意义核,另一个是随上下文而在实际使用中不断变化的场合义。这样一来,在读者所看到的文本中,就包含两种不同的意义结构。而其中的核心意义是要通过文本脉络以及文本所隶属的文化传统加以解读。”^②

格雷马斯首次将符号学的研究扩大到文本层面,他通过引入更具本质特征的深层语义结构回答了符号的意指方式问题。由此,格雷马斯发展了结构主义符号学,实现了超越。

2. 罗兰·巴特的前期符号学思想

罗兰·巴特是法国符号学研究的中流砥柱,其思想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向解构主义转变的全部过程。前期罗兰·巴特的思想以《写作的零度》(1953)、《符号学原理》(1966)为代表,致力于探讨能指背后的终极意义和稳定秩序,表现出鲜明的结构主义色彩;后期罗兰·巴特以《S/Z》(1970)、《符号帝国》(1970)、《文本的快感》(1973)为代表,致力于消解逻辑、结构和终极意义,走上了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道路。罗兰·巴特前期的思想直接影响到互文性理论的形成,而后期罗兰·巴特的思想则是在克里斯蒂娃互文性理论的后发下展开的。

巴特在《符号学原理》中将符号区分为E(能指)、R(将能指、所指结合起来的两者关系)、C(所指)三个要素。他认为,符号的意指系统并不总是像索绪尔所言是能指对应所指的单层结构,有时,它也表现出多层套叠的特征。这种套叠有两种方式:1. 第一层指意系统(ERC)充当第二层的能指,形成(ERC)RC的结构。2. 第一层指意系统充当第二层的所指,形成ER(ERC)的结构。指意结构1可称为涵指结构,它描述了符号的概念意义与社会文化意义相分离的现象。我们以“龙”为例进行分析。“龙”的指意系统中包含着两层结构。第一层:E(“龙”)RC(一种虚构的生物);第二层:E(由“龙”指称虚构生物的符号整体)RC(皇帝)。由此,第一层级作为整体进入第二层,形成(ERC)RC的涵指关系。指意结构2即元语言结构。它是用于分析和描写另一种语言的符号结构:对象语言的ERC构成第一意指层级,它作为所指进入第二层,与元语言成分共同构成ER(ERC)的意指结构。^③

前期罗兰·巴特虽致力于寻找符号背后的稳定秩序,但他关于指意系统多层化的研究却消除了稳定、一致的终极意义,使流动、不稳定的意义得以产生。这一观点影响了克里斯蒂娃,也超越了结构主义,预示着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思潮即将来临。

3. 德里达的“延异”符号学

从格雷马斯到早期罗兰·巴特,法国符号学家以否定能指/所指的简单对应关系为起点,对

① 马津 《索绪尔的易位书写理论及其影响》,《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②③ 高宣扬 《当代法国哲学导论》(下卷),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88-689页。

符号的指意过程和指意方式进行重新审视, 实现了对早期结构主义的超越。而在这一点上, 德里达无疑走得更远。他不满足于仅仅探讨能指与所指的复杂关系, 而是从根本上否定能指指向所指的前提。德里达认为: 能指并不指向所指, 而是在语言的游戏不断地替代其他能指。意义在这种替代的过程中无限播撒, 始终处于未完成状态, 而具有终极意义的所指却始终缺席。^① 德里达将文字(符号)意义的这种播撒状态称为“延异”。延异, 即“空间的分裂”和“时间的延迟”^②。它是意义产生的原因和过程: 能指在不同的时空、文本中使用, 意义在文本间流转生成, 呈现出流动性、不稳定性和多元性特征。

综上, 20世纪60年代, 法国思想界经历了由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转向。以格雷马斯、罗兰·巴特、德里达为代表的符号学家通过重新审视符号的意指过程和方式, 消解了能指与所指简单对应的结构主义观点。这些新思考激励着克里斯蒂娃, 为其符号学思想的诞生提供了良好的学术氛围。

(三) 东欧学术文化与互文性理论

法国符号学家们虽然各自构拟了符号指意的新途径, 但终究没能说明符号意义从无到有的生成过程和机制。这时, 克里斯蒂娃的东欧学术背景给她的思考提供了助益, 促使互文性理论的最终成型。

1. 马克思的商品价值理论

出生并成长于保加利亚的克里斯蒂娃对马克思的思想了如指掌。当她致力于构建符号的指意过程理论时, 马克思关于商品生产与等价交换的论述给了她启迪。

马克思在讨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时, 揭示了商品价值的生产规律。他认为: 商品之所以具有价值, 是因为其中凝结了无差别的人类劳动, 而这“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实为商品生产者对自然物进行的人为加工。因此, 外在于商品的自然物质要素(劳动对象)是商品获得价值的前提, 在商品生产中具有重要意义。

克里斯蒂娃认为, 这一价值生产模式可以用来解释符号意义的形成问题。“马克思关于交换体系的批判性考察, 可以让人想起有关符号和意义流通的现代批判。”^③ 当我们把符号的指意过程视作商品的生产过程, 那么符号的意义就是凝结了物质性资料和人类劳动的商品。意义不是靠能指指称所指的固定关系获得的, 而是在主体对物质性资料(先前存在的其他文本)进行加工的过程中生产出来的。

如此, 克里斯蒂娃成功地将符号的意指过程转化为意义的生产实践, 突出强调了符号意义的生成性特征。同时得到强调的, 还有外在于语言的物质性要素(他文本)。在这样的视野转换中, 克里斯蒂娃将被结构主义排除的外部因素重新纳入了研究视域。

2. 巴赫金的对话哲学

马克思为克里斯蒂娃提供了意义形成的生产模式, 但对“在不拥有意义的情况下……意义以前的劳动, 马克思没有研究的意图和手段”^④, 马克思只是从劳动生产的外部提出了这一生产过程, 却没有阐明物质资料究竟如何参与到商品价值的生产之中。对克里斯蒂娃而言, 这一点恰恰最为重要。于是, 在马克思之外, 克里斯蒂娃又引入了巴赫金, 以探讨意义生成的具体机制。

巴赫金的研究是作为对俄国形式主义的反拨和改造而提出的。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文学是语言

① 关于罗兰·巴特的前期符号学思想, 参见张桂荣《关于罗兰·巴特符号学理论的简述》, 《鸡西大学学报》2010年第8期。

② 肖娴《对解构主义意义观的超越——从符号学视角对德里达的剖析》,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③④ [日]西川直子《克里斯蒂娃: 多元逻辑》, 王青、陈虎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年, 第31-32页。

的艺术,文学文本的意义只存在于作品的语言结构之中。因此,他们试图将文学研究封闭在语言形式之内,切断其与外部生活世界的联系。巴赫金反对这样的研究思路,他认为社会生活是文学、语言的根本,脱离社会性的文学、语言研究将会是无源之水,难以为继。为此,巴赫金重新界定了文本概念,并建立自己的超语言学研究体系。

巴赫金将文本视为“任何人文学科的第一性实体和出发点”。除了语言结构,文本中还包括超越这一结构的社会性方面。这种社会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 文本中的话语总是属于特定主体的,表达了主体在社会环境中形成的意向和意识,表现为主体的声音;2. 文本中的话语总是针对他人话语而发,对他人话语作出回应,同时期待他人话语的反馈。话语是主体与其他主体进行社会交际的载体,具有对话性。在这个意义上,巴赫金的文本就不再是僵死的、不与外界沟通的语言结构了:“文本的本质是生活事件。”其中充满他人的声音,是主体与其他主体对话的场域。^①

以“对话性”为核心,巴赫金构建了他的语言哲学。他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创作中详细介绍了对话理论:话语可分为对话与独白,“独白原则最大限度地否认在自身之外还存在着他人的平等的且有回应的意识”,而“复调(对话)的实质恰恰在于:不同声音在这里仍保持各自的独立,作为独立的声音结合在一个统一体中”^②。由于话语总是承载着主体的思想并时刻处于与其他话语的交流之中,纯粹的独白实际上并不存在,对话性是话语的本质特征。不仅如此,由于人的社会生活通常是被语言填充的,对话性就不仅是语言的本质,更是社会生活的核心。“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③如此,对话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

巴赫金对话思想的最大成就在于:它不仅质疑形式主义孤立、静态的研究方法,还切实地建构出超越、代替它的新理念:世界不是孤立、静止的结构,而是在开放、动态的对话关系中互动、发展的。一切的现象和意义都产生于主体间的对话。

对克里斯蒂娃而言,巴赫金的理论无疑在说:符号的意义是在不同声音的对话过程中产生的。于是,克里斯蒂娃从文本视角重新解读巴赫金,以互文性概念代替互主体性概念,将符号意义的生成机制归结于不同文本在当下文本空间中的相互作用,相互吸收和转换。

(四) 互文性理论

到法国不久,克里斯蒂娃即加入到探索符号学研究新方法,促使符号学超越结构主义研究范式的队列之中。她结合东欧和西欧的学术文化思想,开创以意义生成性和互文性为特色的符号学理论。^④

克里斯蒂娃将符号学的研究对象设定为文本。文本不是仅仅传达情报信息的语言形式,而是“具有意义生产功能的超语言学装置”。意义不是传达的,而是生成的。文本为这种意义的生成提供空间,而意义生成的具体机制即互文性。

互文性指“种种文本之间的相互转换关系”。它强调任何文本都处于与其他文本的相互关联

①② 巴赫金《诗学与访谈》,白仁春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81-306、27页。

③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白仁春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344页。

④ 关于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思想,参见王铭玉《符号的互文性与解析符号学》,《求是学刊》2011年第3期;姚成贺、张辉《动态·多元·互文——克里斯蒂娃的文本理论》,《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3期;祝克懿《互文:语篇研究的新论域》,《当代修辞学》,2010年第5期;祝克懿《克里斯蒂娃与互文语篇理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0月24日;朱莉娅·克里斯蒂娃《互文性理论与文本运用》,黄蓓译,《当代修辞学》2014年第5期;朱莉娅·克里斯蒂娃《互文性理论对结构主义的继承和突破》,黄蓓译,《当代修辞学》2013年第5期。

之中, 符号的意义则在文本的交织中演变、发展。一个确定的文本中往往渗透了来自其他文本的话语, 这些话语在当下文本的空间中相遇, 它们相互吸收、排斥、转化、整合, 使文本的意义慢慢浮现, 最终完成指意的实践。但即使指意实践完成, 也不意味着文本的意义就稳定了, 文本随时会与后来产生的其他文本发生关系, 每一次的互文, 都可能带来意义的更新。符号的意义就是在这种文本的相互关系和作用中不断地转换生成。^①

由此, 克里斯蒂娃先在巴特的研讨班上, 后在《符号学: 符义分析探索集》《作为文本的小说》等著作中建构了以意义生产性和互文性为特色的符号学理论。这一理论关注符号意义的生成过程, 强调意义生成的互文机制, 它的核心精神可以概括为: 符号的意义不是先验存在的, 而是在文本生产过程中生成的。当下文本为其他文本的相互交织提供空间, 众多的他文本在当下文本的空间中相互作用, 符号的意义就在这样相互作用中逐渐浮现。

(五) 小结

1965 年到 70 年代初期是克里斯蒂娃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中, 克里斯蒂娃充分运用其东欧-苏联学术背景与西方学术传统, 提出了关注意义生成机制的互文性理论。这一理论通过强调符号的意义形成于当下文本空间中文本的相互作用而超越了结构主义符号学静态、封闭的研究方法。互文性理论引鉴、见证, 并参与了法国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思潮, 成为这一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阶段: 20 世纪 70 年代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 克里斯蒂娃越来越关注精神分析学说, 逐步将精神分析的研究范式引入符号学的研究之中。她以精神分析的研究方法改造互文性理论而发展出的解析符号学就成形于这一时期。

解析符号学是对互文性理论的发展和升华。互文性理论虽然以文本的相互交织、作用来解释符号意义的生成机制, 但并没有解决符号指意的所有问题, 比如: 驱使不同文本在当下文本的空间中相互交织的原动力是什么? 符号指意在互文性机制的作用下究竟如何发生? 带着这些问题, 克里斯蒂娃重新开始了对符号意指问题的探索, 出版了《诗歌语言革命》(1974)、《多元逻辑》(1977) 等重要著作。

在这一阶段, 除了精神分析学说, 当代法国哲学中关于主体性问题的探讨也为克里斯蒂娃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养分。下文将对两者进行简要介绍。

(一) 精神分析与解析符号学

当克里斯蒂娃将崭新的巴赫金连同自己的互文性理论介绍给法国学界后, 似乎是出于回馈, 法国学界让她注意到了弗洛伊德。从此, 克里斯蒂娃的研究生命与精神分析结下了不解之缘。事实上, 克里斯蒂娃刚到法国时就受到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 这在她早期的著作《符号学: 符义分析探索集》中就有所体现。她自己也说“我刚到巴黎时, 大家都去尤尔姆大街和索邦大学法学院听他(拉康)的讲座……后来, 因制定旅行中国的计划, 我们就定期会面了。”^②“克里斯蒂娃被引领着从互文性分析走向精神分析, 既是一种内心的召唤, 也确属一种理论发展的必

① [日] 西川直子《克里斯蒂娃: 多元逻辑》, 王青、陈虎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第 43-54 页。

② [法]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思考之危境: 克里斯蒂娃访谈录》, 纳瓦罗访谈, 吴锡德译, 台北: 麦田出版社, 2005 年, 第 13 页。

然。”^① 克里斯蒂娃开始全面研究精神分析,并以它为核心重构符号学理论,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的。而谈到精神分析对克里斯蒂娃的影响,则绕不开弗洛伊德和拉康两位大家。

1. 弗洛伊德与解析符号学

弗洛伊德最早创立了精神分析学说。这一学说最大的成就是发现了人类心理的潜意识领域。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可分为三个领域:意识是人的注意力当下关注的领域,前意识是人之前关注过,可以被记忆唤醒的领域,潜意识是人意识不到的心理领域。潜意识中充斥着人类本能的性冲动,这些冲动天然趋向于宣发,但又会受到社会文化规约的制约而不能自由表达。只有符合社会文化规约要求的本能冲动才能进入意识,得到关注,而与这些规约相冲突的冲动就会被意识压抑,继续存在于潜意识之中,或者转变形式,以符合规约要求的形式呈现,才能进入意识,得到表达。因此,如文学、艺术、科学研究等人类活动的高级形式从根本上说都是本能性冲动在社会条件下无法直接宣发而发生变异和升华的结果。由此,弗洛伊德将人类本能欲动的宣发和社会规约对欲动的压抑描述为精神分析的核心精神。^②

克里斯蒂娃将这一分析模式借入符号学的研究。她将文本看做主体欲动和话语规约相互作用的产物,通过分析话语发生过程中欲动与规约相互作用的各种样态把握符号的成义过程。正是由于欲动的加入,文本空间中诸文本的相互作用、相互交织才有了动力。因此,精神分析欲动、规约相互作用的研究范式实为解析符号学思想的理论基础。

除了欲动、规约相互作用的分析模式外,弗洛伊德关于死亡欲动的学说也对解析符号学具有重要价值。弗洛伊德在《快感原则的彼岸》(1920)中探讨了死亡欲动的问题。他发现,儿童的心理并不是像他之前设想的那样在“快感原则的支配下……逃避不快,向产生愉快的结局前进”。当男孩的母亲长时间离开时,孩子并不是出于逃避不快的心理对此事绝口不提,而是将手里拿着的东西一件件扔开,一边咕哝着“不在啦”,“不在啦”,以此不断重复着母亲离去的痛苦经历。弗洛伊德认为这是存在于人类无意识中的死亡欲动在起作用。“与总是将有机的东西归纳为更大的同一的、作为结合原理的爱欲‘生的冲动’相对,死亡欲动是反过来力图解除结合,回归于原初的无机世界的静止状态的倒退的破坏与攻击的冲动。”这种致力于回归原始的死亡欲动“比快感原则更加具有根源性”^③。

克里斯蒂娃将死亡欲动的概念引入解析符号学,发展成弃却欲动,用它来解释符号成义从混乱的前符号态向有序的符号象征态过渡的奥秘。“从处于前符号的场的流动状态的物质异质性到停滞的静态表象,进行这种转换的东西被认为是弃却欲动。正是由于被弃却抛弃、放逐的东西变成了不能象征化、不被表象的外部,所以才能形成符号、象征,由此产生的代理表象也成为可能。”^④ 简而言之,符号的成义是在欲动与规约的相互作用下从混乱到有序的发展过程,而导致符号意义从混乱状态发展到有序线条的原因就是弃却。弃却将无法被结构化的东西排除在外,使跃动的欲动定格为可把握的象征结构。

综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为解析符号学提供了理论基础:首先,精神分析理论中欲动、规约相互作用的分析模式为解析符号学提供了理论范式;其次,死亡欲动概念为克里斯蒂娃描述符号成义从混乱到有序的过程提供了理论支撑,为揭示象征结构从前符号态中生成的实现机

① 祝克懿《互文性理论的多声构成》(武士)、巴赫金与本维尼斯特、弗洛伊德,《当代修辞学》2013年第5期。

② 关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具体参见[法]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③ [法]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心理哲学》,杨韶刚等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年,第30-38页。

④ [日]西川直子《克里斯托娃:多元逻辑》,王青、陈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56页。转引自[法]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上)》,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46页。

制提供了心理学依据。

2. 拉康与解析符号学

克里斯蒂娃最早是通过拉康了解精神分析学说的。虽然她最终溯源到了弗洛伊德, 但拉康的思想对解析符号学的形成仍具有重要意义。

拉康是弗洛伊德之后最有成就的精神分析学家。他最大的贡献在于将语言学纳入了精神分析的研究, 并发展出独具特色的主体理论。拉康认为: 人是符号的动物, 只有在符号中才能把握人的主体性。主体性不是与生俱来、始终一致的, 而是在语言的使用过程中形成的。主体不是言语活动的前提, 而是言语活动的结果。

以这一观点为基础, 拉康将人的主体性分为想象界、符号界和实在界三个领域。第一, 想象界: 主体在镜像阶段时期(6-18个月大)逐渐意识到镜子中的形象就是自己, 开始了最初的自我认同, 是为主体形成的第一步。拉康用“想象”来指称这段形象思维支配下的主体认同心理。第二, 符号界: 当语言作为外在的强制性力量侵入主体后, 主体就以语言为工具进行自我认同, 其结果就是主体的形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拉康得出他独特的主体观——主体在语言中形成。第三, 实在界: 主体在符号界中形成, 但符号界中的主体所认同的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自己, 而是作为客体, 被语言指称的自己。语言是外于个体的强制性力量, 被语言指称的“自己”也是外在的语言世界(及其社会文化)所规定、允准的自己。正如拉康(1953)所言: “我在语言中识别自我, 但只有当自我像客体一样迷失在语言中时, 才能做到这一点。”^①于是, 这里就存在一个始终未被言说的真实自我。由于语言工具的干预, 人们永远无法与这个真实的自我达成认同, 它始终缺席, 却又理应存在, 这就是实在界的主体。^②

克里斯蒂娃吸收了拉康全新的主体观念和他对主体三个领域的划分, 发展出过程主体观及前符号态与符号象征态的区分。过程主体观根源于拉康“主体在语言中形成”的思想, 认为使用符号的主体并不是固定不变、始终如一的, 而是在符号使用的过程中, 在符号意义的生成中逐渐形成、发展的。而对符号存在状态做前符号态与符号象征态的区分则是基于拉康对主体领域的想象界与符号界的区分发展而来。这两部分内容在解析符号学的理论框架中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过程主体观构成了解析符号学的主体观念, 为符号意义的动态生成提供理论前提; 对符号存在状态的划分, 尤其是前符号态概念的提出则是解析符号学的核心内容, 也是解析符号学超越结构主义符号学和早期互文性理论的关键所在。如果说, 弗洛伊德的重要意义在于为解析符号学提供了理论范式的话, 拉康则为这个理论框架填充了最主要的内容。

(二) 法国当代哲学与解析符号学

与互文性理论相比, 解析符号学关注符号意义的生成过程, 将符号的成义看作是不同文本在互文空间中相互交织的动态结果。与互文性理论相比, 解析符号学对文本的交织问题思考得更为全面和深入。这种全面和深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 引入精神分析欲动、规约相互作用的研究范式, 解决了文本相互交织的动力源问题。2. 强调主体性的重要地位, 以异质性、过程性的主体引领符号意义的生成过程。除了精神分析学说外, 当代法国哲学思潮在解决上述问题上也有重要价值。

法国哲学思想家阿兰·巴迪乌(2008)认为, 20世纪后半期开始的法国哲学思潮与古希腊哲学、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齐名, 是哲学史上的三大历史时刻之一。这次哲学思潮历经萨特、巴什拉、梅洛—庞蒂、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福柯、德里达、拉康、德勒兹……是

①② [法] 阿兰·巴迪乌 《当代法国哲学思潮》, 陈杰、李谧译, 《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12期。

“一场围绕主体问题的概念之战”。“人,一方面是有机的生物体,另一方面又是抽象概念的创造者,他的主体性混合了其内在的生物性以及思维所赋予的创造能力和抽象能力”。阿兰·巴迪乌认为:当代哲学关于主体性的争论起源于 20 世纪初,是柏格森内在生命哲学(强调主体的生物性、非理性)和布伦茨威格数学哲学(强调主体的抽象思维能力)之争的延续。“自从柏格森和布伦茨威格走上不同的道路,20 世纪法国哲学围绕着人的主体问题,通过探讨肉体与思维、生命与概念的关系,一砖一瓦地发展起来。”^①

在探讨“生命与概念”、“肉体与思维”、感性与理性相互关系的过程中,法国哲学家颠覆了传统的主体观。传统的主体观以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式的思辨主体为代表,将主体性定义为人类的理性思维,而将感性的、身体的、创造力等非理性因素排除在外。当代法国哲学家则认为:理性的、反思的主体不能说明人类主体性的全部问题,感性的、混沌的、富于创造力的身体主体同样是人类主体的重要形象。由此,一个崭新的主体诞生“当代作为主体的人,较之笛卡尔笔下的主体,内涵更为丰富,它带有更为模糊的色彩,其生命与肉体的关系更加难以割裂;它更接近于一种生产或者说创造过程,这种创造力使其内部聚集了更为巨大的潜力。”^②全新的主体既包含传统的理性主体,又包含了以感性、身体性、创造性为特点的非理性主体的因素。综上,理性与非理性统一、共存的全新主体观是当代法国哲学献给哲学史最独特的礼物。

如果将当代法国哲学的精髓概括为全新主体观的诞生的话,那么克里斯蒂娃无疑把握住了这一精髓,并借鉴它完善了解析符号学的理论。解析符号学强调主体因素在符号成义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她所谓的主体指的就是既包含理性主体又包含非理性主体的异质性主体。异质性主体的创设是符号成义过程中异质因素相互作用的前提。正是在法国当代哲学思考的启示下,克里斯蒂娃提出异质性主体的概念,才使得强调符号意义在异质因素的相互作用下生成的解析符号学理论得以成立。

(三) 解析符号学的理论框架

解析符号学(semi-analysis)即符号学研究(semiotics)和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的结合,是“一种通过精神分析对语言学所作的反形式主义的重新阅读”^③。其实,早在《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中,克里斯蒂娃已经开始用“解析符号学”来命名她的理论,不过当时的理论体系中,精神分析只是作为对互文性思想的点缀时隐时现,并不构成理论的核心。而本阶段,克里斯蒂娃全面引入精神分析,并以其核心分析模式(欲动、规约的相互作用)来重构自己的思想体系。因此,如果说克里斯蒂娃第一阶段的理论是以意义的生成性和互文性为基本内容的话,本阶段的符号学理论就是以精神分析为核心特征的名副其实的解析符号学了。

解析符号学将文本看做主体欲动与话语规约相互作用的产物,它通过分析欲动与规约相互作用的具体情状研究符号意义的生成过程和文本的生产样态。殷祯岑(2013;2015)已对这一理论进行较为详细的梳理和阐释,本文不再赘言^④。结合下图略作介绍:

如图,解析符号学以异质性为核心精神,其具体内容为文本生产过程(符号意义的生成过程中主体欲动与话语规约的共存和相互作用。这样的异质性投射到主体层面、符号存在状态层面和文本层面,产生了一系列的新概念,并将它们凝聚成统一、完整的理论体系。

①② [法] 弗朗索瓦·多斯《结构主义史》,季广茂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 年,第 116-161 页。

③ 孙秀丽《解析符号学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年,第 35 页。

④ 关于解析符号学理论的具体内容,请参见:殷祯岑《新官场小说官场话语的解析符号学研究》,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13 年,第 26-22 页;殷祯岑《语篇·主体·精神分析——话语分析的精神分析方法浅论》,《当代修辞学》2015 年第 3 期;Kristeva, Julia.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在主体层面,解析符号学的异质性精神体现为理性主体与非理性主体的共存。传统的语言学理论均建立在理性主体的基础之上,而解析符号学受精神分析学说影响,强调主体中多元、混乱、不稳定的非理性因素,从而颠覆了纯粹的理性主体观,为符号成义过程的研究奠定了由理性主体和非理性主体共同构成的分裂主体观的基础。

在符号存在状态层面,解析符号学的异质性精神体现为对前符号态与符号象征态的区分。符号象征态是符号意义的最终实现状态,意义以稳定结构的形式呈现出来;而前符号态是符号意义尚未形成的初始状态,它类似于物理学中的场,场中活跃着各种各样的本能冲动。这些冲动凌乱而发散,互不相干,等待着话语规约将它们整合起来。在时间上,前符号态先于符号象征态发生作用,它不具有稳定的意义结构,却是意义生成的母体和基础。意义的生成就是前符号态向符号象征态的转化过程。

在文本层面,异质性体现为生成文本与现象文本的划分。现象文本是作为现象的文本,就是我们日常所见的有形文本,而生成文本是作为生成过程的文本,它“将现象文本‘摧毁、多层化、空间化、动态化’”^①,使之成为同时具有多重意义的复量结构。

如此,在分裂主体观的基础上,克里斯蒂娃构拟了从前符号态向符号象征态,从生成文本向现象文本转化的符号成义过程。而这一过程实际上衔接了克氏在第一阶段中提出的互文性理论。站在展现解析符号学的立场上,文本的互文性实际上描述了各种源文本在主体欲动的内化作用之下进入意义生成的前符号态空间,在其中交织、拼合,并与结构规约相互作用,最终形成稳定的符号象征态文本的动态过程。在第一阶段,克里斯蒂娃虽然从文本层面界定了意义生成的互文机制,却无力解释诸多文本在当下语篇中交织、互动,生成意义的动力来源问题,而在本阶段,由于精神分析研究方法的全面引入,这一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

(四) 小结

20世纪70年代是克里斯蒂娃思想形成的第二阶段。本阶段的特点在于,克里斯蒂娃将精神分析学说与符号学研究融会贯通,以欲动、规约的异质作用重构互文性理论,同时注重主体因素在符号成义过程中的作用,形成解析符号学的理论框架。

解析符号学继续关注符号意义的生成过程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精神分析的参与下,解析符号学在语言学研究中引入了主体维度和外部环境维度,为文本的互文交织提供了动力源,实现了对意义生成过程的全局观照,也实现了对结构主义及早期互文性理论的超越和升华。

第三阶段: 20世纪80年代之后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克里斯蒂娃逐渐加强对精神分析的研究。在1974年中国之行后,克里斯蒂娃开始超越符号学的研究领域,对精神分析本体、社会学、政治学、母性-女性问题等进行了深入思考。此后,克里斯蒂娃逐渐将研究的重点转向精神分析领域,完成了由语言学研究向精神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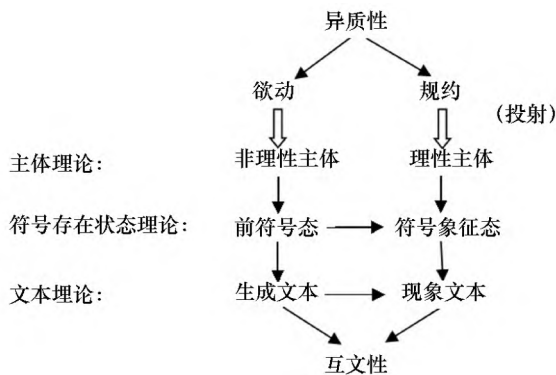


图1 解析符号学理论体系图

① [法]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词语、对话和小说》，祝克懿、宋姝锦译，黄蓓校《当代修辞学》2012年第4期。

析研究的转型。从此,克里斯蒂娃不再只限于将哲学、心理学的理论用于语言学研究,而是以精神分析为主体,以解析符号学为据点,不断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

本阶段,克里斯蒂娃主要涉及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社会、政治等领域的研究,而她在前两个阶段所创立的符号学思想则作为主线,始终贯穿在这诸多领域的思考之中。解析符号学对克里斯蒂娃本阶段研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 本阶段对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文学、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都以解析符号学中欲动、规约的相互作用模式和符号成义从前符号态向符号象征态过渡的模式建构,本阶段所研究的话题可以看做是克里斯蒂娃运用解析符号学理论对社会生活各领域中符号现象及指意过程进行的具体阐释。2. 在本阶段,克里斯蒂娃的著作一改之前理论阐述式的写作风格,用感性的、体验性的、碎片化的文学笔调展现其思想和理论,实践了解析符号学注重非理性、身体性异质要素的理念。本节即从精神分析研究、女性主义研究和社会政治研究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展现克里斯蒂娃本期思想的概貌。

首先是精神分析的研究。克里斯蒂娃的精神分析研究主要集中在《爱情传奇》(1983)、《黑色的太阳——抑郁与忧郁》(1987)、《精神的新疾病》(1993)等著作中。她用符号成义从前符号态向符号象征态转化的观点研究婴儿从母子联合体中脱离,发展成独立主体的过程,及在此过程中母性的存在与被弃的历史。克里斯蒂娃以符号的成义过程把握母性的本质,并涉及对爱、抑郁、恐怖症、污秽禁忌、宗教戒律等问题的探讨。由于以解析符号学理论为支点,将主体的形成过程看做符号的成义过程,克里斯蒂娃得以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切入主体性的研究,关注母性和爱,得出与传统的仅关注父亲角色的精神分析迥异的研究成果。^①

其次是对女性问题的研究。克里斯蒂娃对女性问题研究的著作主要有《中国妇女》(1974)、《女性的性与神圣》(1998)等。“她的女性论不是自我封闭与所谓女性论的领域中,它同时是横跨文本论、政治论、精神分析论的状态。”^②其主要观点可以概括如下:男性犹如符号象征态,具有线性的、决定性的、理性有序的特征,显得强硬而异质;女性犹如前符号态,具有反复的、混沌的、非理性的特征,显得温柔和多元。在这些差异的制导下,女性主义运动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女性主义运动“高喊男女同权、两性平等的口号”。女性完全放弃自己的异质性特征,像男性一样生活。第二阶段的女性主义强调男女之间的差异。女性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具有感性、反复、多元的前符号态特质,并强调这一特殊性,以冲击由男性符号象征态建构的社会结构。反社会性成为这一阶段女性运动的基本特征。第三阶段的女性主义打破男、女的划分,认为差别不在于天生的性别,而在于个人的特质。男性心理之中可能存在女性特质,而女性心理中可能存在男性的特质。克里斯蒂娃倾向于第三种观点的女性主义的研究,并将其中最为重要的概念——女性特质——解释为对母性的欲望。^③

最后是关于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克里斯蒂娃关于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包含在《恐怖的权力——论弃却》(1980)、《外国人——我们内在的东西》(1989)等著作中。克里斯蒂娃的核心观点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不应用统一的标准去固化和物化成员独特的个性。政府或社会管理者的职责不是压抑异质性成分以维护整体的统一与和谐,而是

① 关于克里斯蒂娃的精神分析思想,请参见[法]朱莉娅·克里斯蒂娃《从同一性到他者》//热奈特等《西方文学理论论文集》,阎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法]朱莉娅·克里斯蒂娃《陌生的自我》,黄蓓译,《当代修辞学》2015年第3期。Kristeva, Julia. *New Maladies of the Soul*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Oliver, Kelly. *The Portable Kristeva*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等。

② [日]西川直子《克里斯托娃:多元逻辑》,王青、陈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79页。

③ 关于克里斯蒂娃的女性主义思想,请参见Kristeva, Julia. *The Kristeva Reader*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Oliver, Kelly. *The Portable Kristeva*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创造条件最大程度地保护每个成员的特质, 最终促成多元、博爱的新世界的形成。这一观点的得出仍与克里斯蒂娃早先的精神分析和解析符号学观点密切相关: 注重个性, 注重差异, 反对形而上的结构本是精神分析和解析符号学的题中之义, 对差异与个性的弘扬深入克里斯蒂娃的思想, 在她各个领域的研究之中都是作为核心精神体现出来。^①

综上,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 克里斯蒂娃完成了由语言学研究向精神分析研究的转型, 将研究范围扩大到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社会、政治等领域。而精神分析和解析符号学思想中的异质性、个体特殊性、非理性、符号成义、从前符号态向符号象征态的转化等观点深化成为其理论的核心精神, 贯穿于她各个领域的研究之中。这些观点的贯通是克里斯蒂娃思想独特性的根源所在。

结 语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是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 但其思想却常常被冠以源流纵横、内容博杂的评价, 较少得到全面、系统的研究。推其原委, 我们认为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 因为克氏思想具备显著的跨学科性质, 其研究涉及符号学、文学、哲学、精神分析、社会政治学、女性主义思想等多个领域, 很难为学者们全面掌握。学者们多从本学科的需要出发对她的部分思想进行零星的挖掘和理解, 而甚少涉及其思想的全貌。第二, 受到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 克里斯蒂娃的思想并没有以理论体系的方式展现, 而是以碎片化的、文学化的、隐喻式的语言散布在多部著作之中。这样的表达方式更适合于表现她在学术思索中感悟到的那些多元、异质, 难以以语言捕捉的幽微思绪, 但同时也加大了读者理解和研究的难度。

然而, 把握克氏思想的全貌及其发展脉络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个全新的观察视角, 对深入理解其思想内容和运用这些思想进行多学科的创新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有鉴于此, 本文致力于系统梳理克里斯蒂娃的学术思想体系及其发展脉络, 将其零星分布的学术思索连贯起来, 还原其被多学科知识结构和解构的表达方式所遮蔽的思想全貌。

本文认为, 克里斯蒂娃的学术思想经历了互文性符号学阶段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70 年代初)、解析符号学阶段 (20 世纪 70 年代) 和精神分析阶段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三个阶段的研究虽各有侧重, 但实为一条连贯的线索: 解析符号学是对互文性理论的深化和升华, 为互文性理论提供了动力支持, 而精神分析时期的研究则是以解析符号学为基点向整个人文学科的辐射和扩展。这样, 看似跨领域不相关的互文性理论, 解析符号学思想和精神分析、社会政治、女性主义研究贯穿起来, 成为相互联系、互动共生的整体。

由此, 本文以克氏思想的历时演变过程为主线, 以在各阶段对其思想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其他理论和研究方法为辅线, 从横向聚合 (共时维度) 和纵向组合 (历时维度) 的双重视角复原学术语境中的克里斯蒂娃, 为多学科视域中的克里斯蒂娃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责任编辑: 陈 芳)

^① 关于克里斯蒂娃的社会政治思想, 请参见 [法]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陌生的自我》, 黄蓓译, 《当代修辞学》2015 年第 3 期; [日] 西川直子《克里斯托娃: 多元逻辑》, 王青、陈虎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罗婷《克里斯特瓦的诗学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 Oliver, Kelly. The Portable Kristeva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